



丹东党史人物传

第二辑



刘铁珊



包乾



吕其恩



任国桢



于清涛



张新生



周景涛



杜国元



刘敬之



周恒



宋传义



包振杰



鲍江兮



刘生国



钟启宇



王奉璋

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丹东党史人物传

第一辑

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

2001年6月

主 编：刘培庚
副主编：万照华
朱秀兰
责任编辑：朱秀兰

中共丹东党史人物传

开本：850×1168 1/32 印数：1—800
字数：226千字 印张：9
编印：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
印刷：中共丹东市委印刷厂⁹

辽新内资F字[2001]第31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2001年6月

丹东党史人物传

目 录

任国桢	曲文良 (1)
张新生	朱秀兰 (20)
赵乃禾	朱秀兰 (38)
李健生	朱秀兰 (41)
包 乾	卢卫权、康爱琴 (46)
于清涛	朱秀兰 (57)
王奉璋	许敬文、宋义祥 (62)
吕其恩	朱秀兰 (75)
宋传义	朱秀兰 (116)
刘澜波	朱秀兰 (121)
钟启宇	刘启发 (156)
鲍江兮	卢卫权 (176)
周景涛	朱秀兰 (191)
刘敬之	朱秀兰 (196)
周 桓	陶作成 (225)
刘生国	朱秀兰 (260)
杜国元	朱秀兰 (264)
苏发成	朱秀兰 (268)
包全杰	康爱琴 (273)

任国桢

曲文良

任国桢，原名任鸿锡，字子卿，又作子清，曾用名任国藩，化名刘子厚。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①，1925 年春到奉天（今沈阳）传播马列主义，进行党的创建工作，是奉天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此后，历任中共奉天特支书记、市委书记，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委员、临委常委、候补常委兼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等职。1929 年秋末，去上海中央干部学习班学习。翌年 3 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先后任中共山东省临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河北省委员，北平（今北京）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1931 年 10 月，任国桢任中共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不久被捕。11 月 13 日，于太原市小东门外壮烈牺牲。

任国桢，先祖为山东省海阳县人，于清乾隆年间迁移到东北

^① 关于任国桢入党时间，一说为 1925 年春，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8 卷，第 227 页。本文认定的入党时间，是根据陈少敏《我所知道的任国桢》一文中说“刘锡五同志说，1924 年，他和任国桢经常一起开会，当时他是团员，而任国桢已经是党员了”而认定的。

岫岩县落户；后又迁到丹东市西郊。

任国桢父亲任殿芳，为人老实厚道，心灵手巧。不仅农活样样精通，而且学会了编苇席。任国桢的母亲任刘氏，是位瘦小的妇女。为人心地善良，稳静淳朴，从不发脾气，十分勤劳。任家，由于全家辛勤劳动，节衣缩食，家庭财产逐渐增多，后来竟有了12间房屋，40余亩稻田，两把剪子的蚕场，4匹骡马，1辆铁轱辘车，一年可收入千余元光洋，但是，任家有30多口人吃饭，去了苛捐杂税所剩不多，生活也不算富裕。

1898年12月23日，任国桢在安东县五区滨江村（今丹东市振安区同兴镇变电村任家堡子）出生，1906年2月，任国桢刚满9岁，便同大哥任国栋入私塾馆读书。这私塾馆离任家十几里路，往返趟河，还得走很多山路，但任教的塾师学业不精，对学生管教也不严。为了找个好塾师，1908年，任国桢又随大哥到家离50里外的穷神庙（今东港市前阳镇脉起村）私塾馆就读，弟兄俩自带粮食，在那里立灶、住宿。所从的塾师王育川，30多岁，是清末的一位秀才，但为人比较开明，思想比较进步，能够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常说古论今，对学生进行爱国爱民教育，使任国桢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忧国忧民的种子。

辛亥革命爆发时，在王先生的鼓动下，任国桢和大哥任国栋在同窗中率先剪掉了辫子，为此被父亲责骂了一顿，还险些挨棒棍。受辛亥革命的影响，经治学严谨的王先生的教诲，任国桢树立为国为民之志，学习更勤奋了。他上课认真听讲，课后手不释卷，夜里躺在炕上也要读一阵子书。他在记文本里写道：“少年不知有为，而老始悔悟，又何异枯木无枝而欲望发荣兹也……愤发而有为正在英年雄壮之日也。”在被先生评为“思想颇佳，词亦平妥”，批为甲等的一篇作文又这样写道：“夫勤也者，愤发之谓也，朝研夕究，终能深造富有日新之业。”这恰是他内心世界的直接表露和思想意识的真实写照。学习勤奋，带来的是成绩优

异。他字写得刚柔相当，工整秀丽，文章也作得通达流畅，说理透彻，颇受先生的欣赏和同窗称赞。

辛亥革命后，安东县先后成立了几所“洋学堂”。1910年2月，任国桢正式进入安东县立第八高级小学，1914年7月，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边道立中学。东边道立中学在思想比较开明的李献廷（字庚芑）老校长的管理下，新思潮比较活跃。受其影响，任国桢不单埋头读书、成绩优异受到学校鼓励；而且这时他更加注意国事时政，经常把自己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强烈感情倾泄于笔端。在《丁巳国庆纪念感言》的作文中，他就热烈歌颂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斗争，赞扬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民主革命家黄兴的不朽功绩，无情鞭挞了袁世凯和张勋之流的肖小的丑恶行径，并对军阀混战、民族危亡表示了不满和忧虑。

在1914年12月间，东边道立中学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县的事件。一天，一些学生和往常一样，正在“嘀嘀哒哒”吹号，驻扎在中学附近的一伙安东商团武装警察，突然气势汹汹地闯来，他们以学生吹号影响了他们正常操练为由，凶暴地殴打了这些学生，这种暴行激怒了学生，更使任国桢怒不可遏。他组织领导学生们罢课，上街游行示威，高呼“解除商团武装”、“向学生赔礼道歉”等口号。学生们的正义行动，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同情。

二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对此，任国桢感到新奇、振奋，渴望得到俄国革命更多消息，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历程和成功经验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于是，他决心中学毕业后，去报考北京大学俄文系。

1918年任国桢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考入北京大学俄文系。入学后，他觉得俄文比英文难学，文法严格、死板，要想在此短

短四年中学好它，非下苦功可。因此，他认真学习，时间抓得很紧，课余时间很少闲逛。除学本专业外，他还爱好古文，钻研音韵学、金石学，也看新书，写新诗。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民主和科学，主张“兼容并包”，聘请以创办《新青年》而闻名的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馆长；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专家和教授齐集北大，而那些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诸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印度作家泰戈尔、中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等，也都被请到北大讲演。任国桢不仅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而且是这些讲演者的热心听众。他风趣地说：“听得懂更好，听不清楚即便看看这些人的风采也好。”但是，在当时那些众多学者、专家、教授的文章和讲演中，使任国桢最受鼓舞和启迪的是“新世纪的曙光出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啊！快快起来！努力去做人的活动！努力去做人的活动！”等李大钊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和讲演。当时，任国桢跟俄文教授伊法尔关系很密切，不仅通过这位老师更多地了解苏联的情况，而且经常给苏联的《真理报》和彼得格勒通讯社（后改为塔斯社）投稿，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因此，有人攻击和诬蔑他是“苏俄的走狗”、“靠卢布过日子”。对此，他充耳不闻，不予理睬。他认为，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越多，对中国革命的方向越明确；他希望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任国桢读大学二年级时，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1919年5月3日，任国桢参加北大全校学生三在院礼堂举行的大会。4日上午，北京大学与其他各校3000多名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任国桢和北大同学一起振臂高呼：“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并参加了围攻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的斗争。6月3日，北大学生研究决定，每天派小组出校活动，任国桢抢先报名，第一天就参加宣传小组，到天安门去宣

传讲演。反动政府如临大敌，慌忙出动大批军警，逮捕讲演学生，驱散听众。任国桢等近 200 名学生被关押起来，翌日，又有 700 多人被捕。直至 6 月 10 日，反动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强大威力，先后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免职，撤走了驻扎北大和满布街头的军警，任国桢等被关押的学生们才重返了课堂。

经过“五四”运动，任国桢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大飞跃，他更加自觉地把个人前途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更加坚定了为改变中国现状、投身于革命洪流的意志。当年他回家度暑假，听说安东县五区白菜地千余名乡民集结起来反抗当局逼缴“牛马捐”，扣留、殴打逼税的警官，打跑了前来镇压的军警，不禁激动万分，鼓动农民说：“打得好，打得好！乡亲们有骨头！”1924 年 7 月，任国桢在北大俄文系毕业后，仍住在景山东街公寓 8 号，在老师鲁迅的大力帮助下，译著出版了《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鲁迅赞扬他译著此书“实在是极有益的事”。任国桢与鲁迅先生多次通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①。

三

1924 年秋，任国桢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春，他受中共北方区委员会派遣，到奉天宣传马列主义，进行党的创建工作。任国桢来到奉天后，通过巩天民等人的关系，寄居在大南门里文华阁纸庄。他常去离住处不远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看书看报，以便接触群众，了解情况。在这里，他与在青年会工作的苏子元相识，并建立了友谊；又由苏子元的介绍认识了阎宝航、郭钢、高子升、吴竹村等一批进步青年学子。1924 年初，朝鲜族美术家共产党员韩乐然，受党中央派遣从上海来东北从事革命活动，韩

① 董德芳：《我的同窗好友任国桢》，陈少敏：《我所知道的任国桢》。

乐然为举办个人画展到青年会商洽，苏子元接待了他，并由此相识相交。通过苏子元的介绍任国桢与韩乐然会面了，从此两个中共党员团结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在奉天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党的组织而并肩工作在一起。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任国桢立刻找苏子元商议把奉天的学生组织起来，搞一次声援“五卅”运动。苏子元表示他能够联络奉天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并征得韩乐然的赞同。随后，苏子元立刻到小河沿盛京医科大学找进步文化组织“白杨社”负责人高滔和吴执中、白希清商量，接着通告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南满中学堂、文会书院、坤光女校等校的学生会代表，到医大召开紧急会议。任国桢请苏子元通知由上海来奉天做团工作的吴晓天也参加了会议，并代表全国学联做声援运动的具体指导和组织工作。6月10日上午，各校2000余名学生来到省公署请愿。向省长王永江提出“向全国发电声援‘五卅’运动”、“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惨杀我同胞”、“发起募捐活动，慰问被难家属，支援罢工工人”等5项要求。奉天当局派教育厅厅长祁公亮到广场，企图喝散学生，被愤怒的学生轰进省长公署。请愿的学生不顾奉天当局武装军警的威胁，派出代表进入公署谈判，大批学生队伍则等候在广场上，秩序井然，当局怕把势态闹大宣称除了游行示威一项外，答应了学生们的其余各项要求。于是，学生们回校了。这场运动，就是沈阳历史上著名的“六·十”运动。各校学生回校后，当局悍然下令学校全部停课，提前放暑假，要学生一律回家。针对这种形势，任国桢和吴晓天建议，利用过去放暑假时办夏令营的习惯，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基地，开办暑期学校，（也称暑期大学）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当时任青年会学生部干事的阎宝航积极支持举办暑期学校，担任校长，并由阎出面聘请任国桢、吴晓天等为主讲教员。6月下旬开学，参加学习的，开始男女各10余人，主要是“学联会”的积极分子了，他们多数思想进

步或倾向共产主义。此外还有“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小学教员、店员和职员等。每天下午5时至7时讲课。任国桢亲自讲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系统介绍社会发展史，阐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革命道理。吴晓天讲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和妇女问题。为了掩人耳目，还请在日本留学回国的国民党员陈日新（陈涛）、民报编辑安怀音和苏尚达讲一些新闻学、财经理论等。这样，在内容上看起来是五花八门，外人很难看清这暑期学校的性质。学校又办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当局不加干涉，所以，办得很顺利。通过在暑期大学的学习，许多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暑期学校结束后，任国桢和吴晓天又把思想进步的学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同学会”（又名“同志会”），经过一段教育培养，陆续吸收了一些人入党入团。8月，成立了中共奉天第一个支部，任国桢任支部书记；同时，成立了共青团奉天第一个支部，吴晓天任支部书记^①。10月初，任国桢被党派到哈尔滨，以编辑《东北早报》为掩护，开辟党的工作^②。到哈尔滨后，他还参加了“中华民族自决会”和“反宗教同盟会”，并利用这样公开或半公开的具有进步倾向的组织，联络和发动群众开展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1925年11月，正当直奉军阀第二次战争处于白炽化的时候，奉系将军郭松龄同冯玉祥携手，签订了反奉密约。23日，郭松龄于滦州誓师倒戈，12月20日已挥师进入奉天附近的新民，郭松龄倒戈反奉虽系军阀内部斗争，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在反奉期间多次发表声明，抗

① 苏子元：《在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会上的发言》内部稿。

② 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沈阳地方组织志》，第77页。

议、通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种种罪行。因此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党的斗争策略支持郭军反奉，并指示，任国桢和陈晦生、彭守朴等人进行策应郭松龄反奉的活动，任国桢参加了国民党员朱霁青为司令的东北革命军，作为总司令部负责交通运输的重要成员，为策应郭松龄而奔波于奉哈之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援助张作霖、郭松龄反奉战争失败。因受郭松龄事件的牵连，12月末，任国桢和陈晦生、彭守朴等人被捕。由于事前已将文件材料销毁，在刑讯中敌人得不到一点东西，但还是以嫌疑犯将任国桢判了11个月徒刑，关进了吉林监狱^①。

1926年11月，任国桢被释出狱，经组织安排仍回奉天。这时奉天支部已于1926年改为奉天特别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特支书记由杨韦坚担任。任国桢也在特支工作。杨韦坚是国民党奉天省党部备案的跨党的中共党员，由于奉天省国民党部负责人被捕，恐杨韦坚受牵连，遂将其转移到吉林，奉天特支书记，由任国桢担任，杨志云任组织委员；高子升任宣传委员。特支机关仍设在原中共奉天支部办公地点，即老精华眼镜公司楼上^②。1927年6月间，奉天特支改为奉天市委，任国桢任市委书记，奉天市委仍隶属中共中央领导。

奉天支部、奉天特支、奉天市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奉天地方党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工农大众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根据东北地区，特别是奉天地区的历史特点，十分注意发动工农群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种斗争。任国桢在担任奉天特支书记、市委书记期间，同组织委员杨志云经常到兵工厂、日资满蒙毛织株式会社、奉天制麻株式会社的工人中去了解情况，进行活动。

① 韩铁生：《任国桢同志在哈尔滨》（内部稿）。

② 《中国共产党沈阳地方组织志》，第77页。

奉天制麻会社是日本人经营的企业，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压迫剥削甚重，工资定额很低，不但得不到任何奖励，甚至连基本工资也挣不到，经常受罚款和体罚，为了改善工人待遇，奉天特支于1927年5月2日发动制麻会社300工人罢工，第二天罢工人数增加到600人。罢工工人向厂方提出：工人劳动达不到定额时，按基本工资发给；工人工资应以现大洋为本位，不要日本金票；不许日本工头打骂中国工人；假期工资照发；罢工复工后，不得借故开除和陷害工人。罢工的第三天，任国桢派杨志云去与工人代表接头谈话，对如何坚持罢工进行具体指导。罢工发动后，日资本家将大棚的独身工人赶出，任国桢与杨志云提议，开展募捐活动，安排独身工人食宿，救济困难工人。任国桢在组织领导制麻会社罢工斗争的同时，还拟定了把罢工斗争扩大到其他日本企业的计划。日本警宪系统也查觉到罢工有向其他企业扩展的趋向，加之制麻会社罢工工人始终坚持条件，毫不动摇，所以厂方只好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并释放了在罢工开始时逮捕的罢工领袖。奉天制麻会社的工人罢工共坚持27天，这是奉天地方党组织首次领导的工人罢工^①，这次罢工的胜利，在奉天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制麻会社罢工胜利后，日本警方觉察到罢工“背后有个强有力的思想团体支持着”，“策谋者的根源可能在厂外”，于是日本特务机关“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加强活动，终于探知罢工与任国桢有关，奉天附属地日本警察署遂于6月29日将任国桢逮捕。在审讯中，他们坚不吐实，日本警察署得不到确实证据，只好将他们引渡给奉天商埠警局，经过两次审讯，任国桢拒不承认与罢工有关；又被转送奉天督军公署军法处，关进小南门奉天第一监狱。因为找不到任何治罪的证据，遂于1928年5月将任国桢释放。

^① 《中国共产党沈阳地方组织志》，第93页。

四

任国桢出监后，由于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暂时回故乡。为了避开敌人的寻迹跟踪，他乘火车进关，在天津取海路达安东浪头，于1928年7月4日到家。年迈的母亲乐得老泪涌淌，不停地抚摸着儿子。任国桢的妻子薛氏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听谣传，丈夫入狱被割耳剜眼，不禁号啕大哭。现在，她见丈夫虽然被敌人折磨的皮包骨头，但毕竟是囫圇的回来了，自然喜得止不住落泪。自从任国桢参加革命，家里人都为他提心吊胆，怕受牵连，把他的户口都给销了，现在见他回来了，都舒了一口气，任国桢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给家庭带来不安，也遭到父兄的怨恨和冷遇，但他毫不介意。他理解作为普通农民的父兄辈的心情，所以借机向家里人和亲朋邻里宣传革命道理，听了他的宣传，亲友中有些人对共产党，对革命道理，有了初步了解。

回家后，任国桢千方百计地打听安东地下党组织，党组织也在设法找他。此期间，任国桢经常去安东青年会馆、安东同善社等处进行活动，并通过安东地下组织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任国桢在大哥任国栋的帮助下说服了父亲、弟弟与妻子的阻拦，于1928年10月初，离开家乡到奉天找满洲省委。

五

任国桢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后，被派往哈尔滨县委工作。此前，哈尔滨县委领导力量很软弱，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使这里的革命活动受到影响。任国桢到县委后，主持改组了哈尔滨县委，并任县委书记。由县委决定，经全体党员通过，对原县委主要领导进行了组织处理，从此，哈尔滨县委的工作走上了正规。这时，哈尔滨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情绪日益高涨。为了把群众的情绪变成斗争行动，把群众斗争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任国

桢到中东路的三十六棚向工人了解情况，宣传鼓动；当了解到工会已变成骑在工人头上的把头时，他非常气愤，亲自帮助工人写呈状，告发工会头头贪赃枉法、勒索敲榨工人的罪行，并编写散发传单，揭露工贼的种种罪恶。提出“工会要为工人谋利益”；“反对把持工会和勾结官厅压迫工人肥私利己的工贼”、“不要投工贼选票”等口号，使工人们精神振奋，欢欣鼓舞，使黄色工会的头头惊慌失色，东藏西躲。他还组织领导机务段、工务段、铁路印刷厂、火磨、油坊、鞋业及老巴夺烟厂等处的工人奋起斗争。在斗争中，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教育锻炼了群众。

1928年10月，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和吉林省议会酝酿签订了《中日民间合筑五路条约》，以实现其修筑五路的野心。消息一透露，哈尔滨的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同胞立刻起来进行反对修五路的斗争。根据省委的指示，任国桢向县委的各基层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全体党团员组织领导好各界群众的斗争。他和县委身先士卒，组织了“反日宣传队”散发传单，进行宣传鼓动。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哈尔滨市民抗路联合会和哈尔滨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11月9日早晨，哈尔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工人及其他各界群众3000多人，在东特二中对过广场集会，高呼“反对日本修筑五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等口号。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群众虽然遭到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但影响很大。

对任国桢及哈尔滨县委的工作，中共满洲省委表示满意，并给予很高的评价。省委在一份关于党务的报告中说：“哈尔滨县委，工作较开展，任（国桢）较肯干（满洲惟一的干部）。”在一份关于组织的报告中说：“现在哈委执行目前的工作是能胜任

的。”^①

1929年2月，经中央批准，任国桢任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6月，任委员、候补常委。7月，哈尔滨县委改组为哈尔滨市委，任市委书记。同年8月1日，任国桢和省委组织部长义山（即丁君羊）一起，组织调动市委和基层支部20多人，突然散发2000多张传单，以显示党的力量，教训敌人。这种没有在群众中做好必要准备，而突然采取行动的做法，受到省委批评，任国桢和市委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工作中及时纠正错误，并给省委写报告，表示要纠正党内一切不正确倾向^②。

1929年8月末，满洲省委主要负责人被捕，省委秘书长廖如愿立刻派人到哈尔滨，把情况报告给正在那里视察工作的省委组织部部长丁君羊和省委候补常委任国桢，请他们二人赶紧回奉天。此时，正值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在奉天视察工作。8月29日，在陈潭秋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丁君羊、任国桢和小姚（饶瀚石）3人为临时常委，组成省临委。

在省临委期间，任国桢代表省委给党中央写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状况及工作方面意见》的报告，报告满洲省委工作情况和奉天、抚顺、辽阳、哈尔滨等组织状况，并根据东北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加强中朝两党关系，加强反对改良主义等工作意见，还卓有见地地提出，应把“对日不合作十人团”改为反帝大同盟的基本组织，加强反帝工作，“在口号上不宜提出‘反对爱国主义’”。他强调团结，特别明确提出反帝斗争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奉系军阀的后台老板——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意见，和当时流行的一些“左”的口号截然不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任国桢写完报告，复往哈尔滨，就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部长。

① 《满洲关于组织工作给中央报告》，1928年12月。

② 《哈尔滨市委给满洲省委的报告》，1929年9月。

1929年秋末，任国桢被派往上海，到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准备接受新的艰巨工作。

六

任国桢到上海，在中央干部组织工作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党中央派往山东恢复省委，开展党的工作，1930年3月12日到达青岛。

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建立较早，中共六大时，这里已有上千名党员，但由于连续遭到破坏，干部牺牲很多，组织所剩无几。任国桢来前，山东党组织又遭到一次大破坏，负责人有8位被捕，机关3处被破坏，济南党的机关，除秘书处的技术书记一人外，其余负责人都被捕入狱。全省党的组织已陷入瘫痪状况。这时，有的同志对敌人产生了畏惧心理，有的认为，要组建新的组织，必须等中央派有经验的人来。任国桢批驳了这些错误认识，指出，这是等待主义和取消观念的极端表现，都要不得。要搞好工作，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他说干就干，立刻与青岛市委一起巡视各中心产业支部，召开市委会议，恢复和建立了四方机车厂、沧口、钟渊、宝来、纱厂等中心产业支部。在斗争中，他经常找干部个别谈话，教育同志，训练干部。他把党的传单和刊物及时发到群众手中，教育群众坚定斗争信心。他积极开展赤色工会、互济会和妇女等方面的工作，救济被捕和遇难同志的家属和失业工人，营救被捕同志。

任国桢将青岛市党的工作安排妥当后，在中共青岛市委牟洪礼陪同下，到潍县巡视。由于中共潍县县委书记曹克明在桥西暴动后脱离组织，任国桢亲自主持召开县委改组会议，组建了新县委，帮助县委制定工作计划，强调县委到县城和东乡发展组织，尤其要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开展工作。指定县委成员速到昌邑、昌乐、广饶、高密巡视，并要求将各县委情况报告省委。他还参加